



■本期关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图书出版背后

编者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出版界精心谋划选题,陆续推出一批主题精品力作。每一本抗战主题图书背后,都凝结着作者对历史的敬畏、编者对真相的坚守。这些文字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自7月7日起,《出版周刊》开设《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图书出版背后》栏目,带领读者探寻这些图书创作、编辑的故事,感受出版人如何以匠心守护记忆,让抗战精神在字里行间永续流传。

抗战口述史《我是谁:战争遗孤启示录》:

“惶恐于来不及,更庆幸此刻正在做”

□本报记者 张席贵

从2020年到2022年,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中日多家单位,历时3年行走于中国东北和日本,跨越中日23座城市,采访拍摄了近百名日本遗孤及其后代。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我是谁:战争遗孤启示录》,这本书让人们永远牢记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从另一面记述了中国养父母抚养日本遗孤的博大胸怀。

回望血与爱的历史

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在撤退和被中国政府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儿童。

据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统计,日本遗孤有4000多名,分布于中国各地,尤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居多,占到90%左右。该书编委刘国君介绍,到2000年,已有2800多名日本遗孤回国定居。

虽然大部分日本遗孤已经回国,但他们从未忘记中国的养父母和抚养他们长大的黑土地,许多日本遗孤选择永久地留在了中国,还有一些日本遗孤去而复返,或是将养父母接到日本居住,更多的日本遗孤自觉地承担起了促进中日友好的义务,以自己

的微薄力量回报中国养父母,回报中国政府,回报中国人民。

刘国君跟踪此选题已有20多年的时间,2019年,一次偶然的契机,他与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一起开始了立项工作,得到了吉林省委宣传部的认可,获得了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的扶持。他们拍摄了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见证人和遗孤问题研究者,并于2023年编辑制作了大型电视纪录片《我是谁:战争遗孤启示录》,此纪录片入围第二十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第十三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入选2023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十大年度项目,英文版《我是日本遗孤》(上下集)于2024年11月30日、12月1日在中国国际电视台面向世界观众播出。

有感于电视纪录片容量有限,大量素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摄制组又从中精选出50位左右相关人员的采访录音编辑成同名书籍。

不让真相随时间远去

“我是谁”是人类对自己的终极追问,是一个哲学命题,而遗孤群体的故事饱含对身份迷途与未竟的追问,所以经过多次讨论,吉林文史出版社最终确定以“我是谁”为题。

刘国君带领团队采访到了多名重要的当事人,包括日本遗孤池田澄

江、长安伊枝子等,书中展示了许多重要的即将消失的历史遗迹照片、档案资料、珍贵手信、老照片等,全面反映了日本遗孤群体和中国养父母的经历、中国人的大爱,表达了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主题。

中国养父母这一群体就是由李淑兰、沙秀清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构成,每一位养父母和日本遗孤都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叫李淑贤的养母,她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皆死于日军刺刀下,而她却毅然收养了敌人的遗孤。李淑贤说:“我恨日本人,但孩子有什么错?”什么能救赎人类的罪恶,什么能洗涤血腥与暴力,什么能让受害者与侵略者握手言和,什么能超越生死、跨越国界?唯有爱。

《我是谁:战争遗孤启示录》用日本战争遗孤这一切口,站在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视角来看待日本侵华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战争牵扯几代人的命运,让读者真实、生动地了解到中国养父母与日本遗孤之间的深情,感受到中国人的大爱。

历时两年精心打磨成稿

吉林文史出版社携手吉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历时两年,从100万字采访稿中精选30多万字,从6000

多张照片里精选300多张,精心打磨书稿。由于被采访者的口述材料在质量、语言表达、叙事逻辑、时长等方面均有差异,就需要作者和编辑做大量后期整理与筛选的工作,以突出每个人物故事的特点和代表性。

责任编辑董芳这样回忆她初读书稿时的心情:“作为一名编辑,我深知这个选题的沉重,当我哭着读完书稿,当我直面战争、人性与身份的撕裂,那种爱恨交织使我久久无法平静。这段历史正加速湮灭,我惶恐于‘来不及’,更庆幸‘此刻正在做’。”

为了保留口述材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书中所展示的插图有的是作者拍摄的重要影像,有的是口述者提供的资料,作者与编辑着力进行了筛选与甄别,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图片的完整度、代表性,所附照片说明的情况与文字内容均呼应。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吉林文史出版社做了5种书籍设计方案;为了一张照片、一个图说、一个名称的准确性,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

董芳说,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让世人了解中国文化中宽容大气的民族精神,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中国养父母博大的胸怀。

吉林文史出版社也精心策划了英文版、日文版,做好版权输出工作,希望通过国际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

抗战小说《孤光》:

以敬畏之心
打捞沉没的细节

□冯静 卢玖诗

2025年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里,同时配合重庆市一系列纪念活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由重庆本土优秀作家婉瑜创作的《孤光》一书。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能够有幸见证和参与《孤光》的付梓,这不仅是莫大的荣誉,而且编辑的过程也是一次深入文本和感悟学习的过程。

这份手记不仅记录了一本书的诞生,更铭刻着一位编辑在历史长河与文字方舟间的精神跋涉。从选题策划到出版发行,优秀出版物的诞生如同“十月怀胎”,需经作者与编辑的千锤百炼。我们以敬畏之心打捞沉没的细节,校准虚构的航向,只为让湮灭于尘埃的名字,在墨香中重获呼吸。

在真实与虚构间构筑历史坐标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作为一本基于历史事实的文学作品,《孤光》最大的看点之一便是用文学的方式和语言,展现和反映历史,既做到尊重历史,又不失文学的温度和可读性。书中多数人物和事件都有历史原型:苏露的原型是中共特工,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女诗人关露”;故事背景设定于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进入大反攻的前夕,此时的中国作为远东情报战的漩涡中心,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暗流汹涌——开篇描写的重庆梁山机场空战是真实战史,日军与新四军争夺陈家港盐场的较量,大规模“清乡”计划的残酷,皆在史料中留有沉重注脚。

在审稿过程中,我们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对待细节:核对情节时间线与历史事件的吻合度,避免逻辑矛盾;恪守“历史的伤痕需要铭记而非展览”的原则,杜绝过度渲染。编辑时,我们梳理每条线索的动机与行动逻辑,确保多方博弈的合理性。对待历史人物原型更需谨慎——关露女士曾背负43年“汉奸”骂名才获得平反,因此我们弱化了苏露“文化汉奸”的公开身份,建议作者聚焦其隐藏身份与牺牲精神,在致敬历史时保持克制的深情,让文字成为缅怀而非消费的载体。

这并非创作一部打着谍战噱头的“抗日爽文”,而是要穿透岁月迷雾,让读者感知那段暗夜搏杀。80年光阴虽让亲历者凋零,却让历史的轮廓在时光冲刷下愈发清晰而沉重,我们必须让虚构的枝叶深深扎根于真实的土壤。

在人性褶皱处雕刻英雄群像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以往谍战题材常将主人公塑造成带有光环的完美特工,这种“超人化”处理看似崇敬,实则是对历史真实的简化。当我们把隐蔽战线工作者神化为没有恐惧、没有弱点的超人时,恰恰剥夺了他们最动人的部分——那些在极端环境下依然保持人性温度的挣扎与坚持。

编辑过程中,我们刻意保留人物的“不完美”:杨怀义遇见与“逝世”妻子相像的伍冰时,因保护欲作出错误判断,“怕这悲剧又在伍冰时身上上演”的执念,让这位硬汉露出柔软肋肋;徐子莹改头换面为“大东亚共荣”形象大使,面对爱人误解时“佯装无所谓”的苦笑与至亲牺牲后“把几百页稿子揉成一团”的崩溃,展现出信仰者的血肉之躯;“笑起来像美国人一样露齿”的细节,勾勒出身份消解与重构的残酷过程——信仰并非天生钢铁,忠诚也不是激情中的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撕裂与缝合中打磨锻造。

我们通过增加动作、神态细节增强角色立体感,让隐蔽战线的战士从概念化为活生生的,他们的恐惧与勇气、迷茫与坚守,共同编织成战争年代最真实的人性图谱。

封面设计中的历史视觉转译

“好书如锦,封面如祺。”在每年如恒河沙数的新书中,封面是读者视线的第一落点,尤其在数字时代,它更是抢占注意力的“视觉武器”。如何将《孤光》的历史厚重感浓缩在32开的纸面上,这成为继文字编辑后的又一挑战。

我们与作者、设计师达成共识:以冷色系营造严肃氛围,用暖色点缀象征光明与希望;摒弃手枪、墨迹等刻板符号,选择更具隐喻性的视觉元素;书名字体需锋利有力;构图要有层次感。经过反复打磨,最终封面以沉稳的深蓝色为底,金色星光为缀,烫金书名在“星光”中形成视觉爆点。街头行走的男女主角剪影,是隐蔽战线工作者的象征——他们坚毅的姿态传递革命力量,纵深构图增加空间感。剪影远处的光芒,暗合“在黑暗中触摸光”的意象,象征着冲破桎梏的胜利曙光。

这帧封面如同一扇“历史视窗”:深蓝是暗夜的底色,光芒是信仰的星火,行走的剪影是无声的抗争,远处的光芒是终将到来的黎明。它让文字的重量转化为视觉的张力,成为连接读者与历史的情感接口。

书写无名英雄,本质上是一场对抗遗忘的战争。谨以此书献给80年前那些在黑暗中独自举着火把前行的灵魂。他们的名字或许未被史书记载,却在文字的经纬中,成为永不熄灭的“孤光”。

抗战主题连环画典藏《胜利与和平》:

5家美术社携手打造“四新”图书

□本报记者 李美霖

当《地道战》的青灰色砖道在32开书页上蜿蜒出幽微纹路,当《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碰撞出跨越时空的光影——80部镌刻着民族记忆的抗战题材连环画,以立意新、内容新、形式新、合作新的“四新”姿态,在《胜利与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四新”连环画典藏》中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历史对话。

人民美术出版社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5家出版社联合推出的这套连环画合集,不仅让小兵张嘎的芦苇荡在疏朗排版中重焕生机,更通过视频形式让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就义跳出纸面,在数字时代重构了抗战历史的视觉叙事坐标系。

提升内容创新性表达

作为新中国美术出版界首次联合出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型经典连环画主题出版物,《胜利与和平》是出版人以连环画为载体对民族集体记忆的抢救性挖掘与创新性表达。

这其中,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出版33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0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各出版13册,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11册。连环画合集于今年6月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高世屹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在连环画围绕重大节点尤其是抗战节点的出版历史上,这是出版社第一次将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纳入的一套连环画合集,呼应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由来,为认识当今动荡的国

际格局提供了一种清醒的认识。”

记者了解到,此前的连环画合集,相对于集中虚构性故事,多呈现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作品以及抗战中的“英雄谱”。而《胜利与和平》则侧重增加了非虚构的战争史实,将虚构与非虚构、历史叙事与人物叙事融为一体,形成内容上的创新性表达。

过去,很多抗战题材出版物往往侧重于国内抗战的讲述,而《胜利与和平》则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融合起来。比如在书中,既有像《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国人民耳熟能详、展现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故事,也纳入了反映世界其他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卓娅、舒拉的故事等内容。这种编排,让读者能够在同一套书中全面地了解到二战时期全球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画卷。

优化主题出版阅读体验

《胜利与和平》包括战史篇、名著篇、英雄篇,每部均新增前言,将该书的内容放在中国抗战、二战的大历史中作出说明,全套形成二部较为完整的二战全景画卷。

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主任何玉麟告诉记者,《胜利与和平》在形式上作出了符合当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传统连环画多采用64开本,字体较小,画面呈现不够清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阅读起来存在一定不便。而这套书采用32开尺寸,单页幅面扩大,给画面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

在《地道战》中,蜿蜒曲折的地道在32开页面上更完整、清晰地呈现,地道内部的结构、暗门等细节都能让读者看得清清楚楚。同时,配合疏朗的排版设计,文字与画面布局合理。



《胜利与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四新”连环画典藏》新书发布会现场。

人美社 供图

文字部分字号适中,行间距拉开,避免了页面的拥挤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视线移动更加舒适,不会因排版紧凑而产生视觉疲劳。

“这种形式上的创新看似简单,实则是充分考虑当代读者阅读心理和习惯的结果,拉近了连环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与当代读者的距离,让更多人愿意翻开这套书,沉浸在抗战故事之中。”何玉麟坦言。

打造“可分可和”营销模式

以构建立体化营销体系为抓手,人民美术出版社通过读者开放日的沉浸式体验、跨平台传播矩阵的精准触达、国际书展平台的品牌亮相,实现了主题出版物的“破圈”传播与市场渗透率的多维提升。

今年4月底,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七十四载,大美无界”为主题,启幕2025年读者开放日暨连环画出版社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这场融合了《胜利与和平》新书发布与特别陈列

展的文化盛宴,吸引了300余位读者亲临现场。

与此同时,这份对出版创新的探索热情,在两个月后的国际平台上迎来再升级——6月20日,《胜利与和平》携“四新”理念登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5家出版社齐聚,围绕“四新”创新展开研讨,共议主题出版物的“破圈”之旅。

另外,“可分可合”的营销模式,既保留整套书的收藏版,满足收藏爱好者的需求,也推出单本平装本,降低阅读门槛,扩大受众范围,使得《胜利与和平》成功吸引了各界目光,让更多人了解到这套蕴含着丰富历史内涵与创新精神的连环画典藏。

“《胜利与和平》在内容上融合中外抗战叙事,以虚实结合呈现多维历史;形式上革新开本设计,通过高清修复与新技术赋能,提升阅读体验;营销上打造‘学术研讨+沉浸体验’矩阵,实现专业深度与大众传播的平衡,为主题出版物的‘破圈’传播提供了可复制的人美方案。”高世屹说道。